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八輯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五卷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語言學論叢

(第二十八輯)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第28辑/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SBN 7-100-03813-8

I. 语… II. 北… III. 语言学-丛刊
IV.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71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ǔYÁN XUÉ LÙNCÓNG

语 言 学 论 丛

(第二十八辑)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813-8/H·968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4 1/4

定价: 32.00 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主 编： 林 焘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贝 罗 贝	丁 邦 新	郭 锡 良	何 九 盈	何 莫 邪
江 蓝 生	蒋 绍 愚	鲁 国 尧	陆 俭 明	梅 祖 麟
平 山 久 雄	裘 锡 圭	唐 作 藩	王 福 堂	王 洪 君
王 士 元	徐 通 锵	余 霭 芹	郑 锦 全	朱 庆 之
邹 嘉 彦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	耿振生	郭 锐	李小凡	宋绍年
王洪君(主任)	詹卫东	张 猛	朱庆之(副主任)	

本辑执行编辑： 宋绍年

执行编辑助理： 杜 轶

今年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学论丛》创刊编委会袁家骅先生、岑麒祥先生的百年诞辰。

我们深深怀念他们！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目 录

王力先生的“谐声说”	唐作藩	(1)
上、去二声源于韵尾说不可信	张 雁	(23)
关于“去声源于-s 尾”的若干证据的商榷	李 香	(34)
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	江蓝生	(43)
试谈汉语历史词义的系统分析法	李佐丰	(61)
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考释	刘 钊	(84)
汉语动词语法化的机制	邢志群	(93)
从汉语史看“多”“少”直接修饰名词问题	汪维辉	(114)
“大叔完聚”考释		
——兼论上古汉语动词“聚”的语义句法特征		
及其演变	杨荣祥	(128)
论“X 着”的词汇化	董秀芳	(138)
“把”字句的语义构造和论元结构	郭 锐	(152)
汉语“韵律词”的界定	吴为善	(182)
试论汉语的声调和节奏——从胡乔木的提问谈起 ..	吴宗济	(197)
客家话古非组字的今读	项梦冰	(214)
应山方言 ts/tʂ 变异研究	汪 锋	(264)
常德方言的“它”字句	易亚新	(288)
闽南漳平方言的“仔”化变调	陈宝贤	(305)

2 目 录

《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读后	忌 浮 (333)
答丁邦新教授	[法]沙加尔 (338)
何谓客家话?	[美]罗杰瑞著,项梦冰译 (340)
ABSTRACTS(英文提要)	(366)

CONTENTS

On the Phonetic Compound Theory of Professor Wang Li	Tang Zuofan (1)
Agains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Rising Tone (上声) and the Departing Tone (去声) Are Derived from Coda	Zhang Yan (23)
A Discussion on Some Evidences that <i>Qusheng</i> (去声) Comes from -s Ending	Li Xiang (34)
Language Contact and the Special Copula Sentence in Yua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Jiang Lansheng (43)
On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hinese Historical Lexical Semantics	Li Zuofeng (61)
Analysis of Characters on Bamboo and Silk in Mawangdui Han Tombs	Liu Zhao (84)
Mechanism of Grammaticalization of Verbs in Chinese	Xing Zhiqun (93)
On Usage of <i>Duo</i> (多) and <i>Shao</i> (少) as Direct Modifier of Nou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Wang Weihui (114)
Interpreting <i>Tai Shu Wan Ju</i> (大叔完聚) : On Syntactic Feature of <i>Ju</i> (聚) in Old Chinese and Its Change	Yang Rongxiang (128)
On the Lexicalization of "X <i>Zhe</i> (着)"	Dong Xiufang (138)

4 CONTENTS

The Semantic Structure and Argument Structure of Ba (把) Construction	Guo Rui (152)
Identification of Prosodic Word in Chinese	Wu Weishan (182)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ones and Rhymes of Chinese: From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Hu Qiaomu	Wu Zongji (197)
Modern Hakka Pronunciation of the Ancient Labiodental Initials	Xiang Mengbing (214)
A Study of ts/tʂ Variations in Yingshan Dialect	Wang Feng (264)
Ta (它)-Sentence in Changde Dialect	Yi Yaxin (288)
Tone Change Originated from the Diminutive Suffix Zhī (仔) in Zhangping Dialect, a Variety of Southern Min	Chen Baoxian (305)
Comments on <i>The Phonetic System of Beijing Dialect as Recorded by Sir Thomas Francis Wade</i> (《威妥玛氏 〈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	Ji Fu (333)
A Reply to Professor Ting Pangsin	Laurent Sagart (338)
What Is a KĒJIĀ Dialect	Jerry Norman, trans. by Xiang Mengbing (340)
ABSTRACTS	(366)

王力先生的“谐声说”^{*}

唐 作 藩

提要 本文根据王力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发表的音韵学论著,分三个阶段比较全面地叙述王力先生运用谐声字与《诗经》用韵研究上古音的成就和观点。着重阐明他的一贯的谐声学说,即形声字是研究古音特别是古韵部的重要材料;但造字时代早于《诗经》时代,当谐声系列与《诗经》用韵发生矛盾的时候,应以《诗经》为标准。又因为谐声系统表现在上古声母上是非常复杂的,王力先生作为严肃的科学家,采取了持重和科学的态度。本文认为对王力先生无端进行攻击和嘲讽的人应该从梁启超先生的论学中吸取教益。

关键词 形声字 同谐声者必同部 《诗经》用韵 谐声时代

一

王力先生(1900—1986)在汉语言文字学诸多领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开创了多门汉语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建立了多种新的学科体系,提出了许多颇有影响的学术观点。王先生的论著和看法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为学界所重视,或经常加以引证,或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不断推动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本文要研讨的王力先生的谐声学说,就是一例。

“谐声”或称形声是汉字的六书之一。主谐字及其得声的一系列字构成谐声系统。谐声字占全部汉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研究上古及远古汉语的重要根据。王力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如何看待与利用谐声字的问题。上世纪20年代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时

^{*} 本文初稿曾请林焘、郭锡良、鲁国尧、陆俭明、何九盈、蒋绍愚等先生过目,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就曾找他的导师王国维(静安)先生探讨过谐声问题。之后他写了一篇《谐声说》(1927年)^①,文言文,篇幅不长,但观点鲜明。文章一开头就指出:“自来音韵家于谐声字,皆以韵说之,谓声母(藩按:指声符)在某韵,从其声者必与之同韵。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严可均《说文声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戚学标《汉字谐声》、姚文田《说文声系》皆主此说。”(十七 95 页)但静安先生“独疑字之衍声,当以纽,不当以韵”,并举“午、杵、许(又作‘鄲’)”为例。王力先生不甚理解,反复思考,认为“制字之初,意在便民;声母同音,即偏旁可知其音,其例易晓;执一御万,识字甚易”。后来由于历时的演变与方音的分化,形声字“或以韵衍,或以纽衍,纷然淆乱,无从知其音读。……由今纽韵读之,音皆不近,是古与声母同音而今异矣”。王先生还认识到,“六书之作,谐声后起,然必权舆于三代以前。降及周末,字音或已微异于古。汉又异周,然去古未远。即其书以求音原,十得八九。每欲从事于此,先为是说,以质于(静安)先生”(96 页)。由此可见,王力先生早在清华做研究生的时候,虽然主要是在从事“中国古文法”的研究,就已开始考虑利用谐声字以研究上古音了。

王力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个人感到先生在音韵学上,特别是对上古音的研究用力最勤,成果也比较多,而且都涉及到谐声问题,反复申述他的谐声学说。王先生对音韵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世纪 30 年代为第一阶段,五六十年代为第二阶段,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则为第三阶段。下面分述之。

二

第一阶段。王力先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从巴黎留学回到清华任教。王先生在法国主要攻读理论语言学与实验语音学,在清华则主讲“普通语言学”和“中国音韵学”。在这一阶段,王先生除了继续语法研究,发表著名的《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 年)、《中国文法中的系词》(1937 年)外,音韵学方面则著有《中国音韵学》(1936 年,后更

名为《汉语音韵学》)及《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年),并重点研究上古音,写了《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年)和《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年)两篇重要论文^②。前者是为后者做准备。“清儒考求古韵,往往历数十年而后成书,或并或分,皆有其当并当分之理。苟细审其异同之所在,则其所以启示吾辈者实多。”(十七 97页)本文则求了自顾炎武以下至黄侃共十家古韵的异同,共分三表。即:一、《诗经》入韵字分类表;二、诸家韵部表;三、诸家分部异同表。第一表“细析谐声偏旁为三十二类,复以《诗经》入韵字系于谐声偏旁之下”(99—106页)。为什么?王先生解释说:“欲考求诸家分部之异同,宜舍合并韵目之旧法(藩按:指夏炘《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仅举《广韵》韵目的做法),但以谐声偏旁区分。然除《诗经》入韵之字而外,诸家或有缺而不论者;故兹篇所述,略依孔广森《诗声类》,只取谐声偏旁之见于《诗》者,其余从缺”(98页)。这种做法表明,王力先生研究上古韵部,既很重视谐声材料,又以《诗经》用韵为主要根据。王先生还说:“比较诸家之异同,非特为博览也;新知之启发,或导源于是”(97页)。所以他接着就撰写了那篇创新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十七 116—196页)。

这篇论文共分十五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与上古韵母有关的韵部、谐声、阴阳对转、声调、开合、洪细、选字及语音与字义的关系等8个问题,其余除第十五部分“结论”外,第二至第十四部分基本上是上古韵母系统(从之蒸系至谈盍系)的解析与图表。其中第十二部分是“脂微分部的理由”,论述脂微分部的缘起、标准、证据及其解释。我们着重看看文中王力先生是如何阐述他的谐声学说的。他在第一部分“2、谐声问题”中说:“自从顾炎武以来,大家都知道谐声偏旁对于古韵归部的重要。段玉裁说得最明白:‘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这一个学说是一般古韵学者恪守不违的。依原则上说,这话是真理。”(119页)但是,在运用谐声材料时,王先生认为还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谐声字的认定。“在迷信‘许学’的人看来,《说文》所认定的声符是不容否定的,这一派可以严可均为代表。但《说

文》所认定声符,而与古音学大相冲突的地方,实在不少。如‘妃’从己声,‘必’从弋声,‘存’从才声,‘杏’从可省声之类,都是很难说得通的。反过来说,有许多未被许慎认为声符的,依音理看来,却该认为声符,如‘義’从我声,‘陸’从壺声之类,都该补正”(119页)。第二,是谐声时代不同于《诗经》时代。王先生认为这个问题更重要,“谐声时代至少比《诗经》时代更早数百年。‘凡同声符者必同部’的原则,在谐声时代是没有例外的,在《诗经》时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依《诗经》韵部看来,‘求’入幽而‘裘’入之,‘夭’入宵而‘夭’入侯,‘奴’入鱼而‘呶’入宵,‘芹’入淳而‘颀’入微,‘惇’入淳而‘敦’入微。诸如此类不在少数。假使我们拘泥于段氏学说,我们只能说是‘合韵’。但是,如果我们把谐声时代认为在《诗经》时代之前,则此种声音的演化并不足怪,我们尽可以把同声符的两个字归入两个韵部,认为极和谐的押韵。……顾炎武以‘裘’入之第二部,孔广森以‘呶’入宵,以‘夭’入侯,都是很好的见解。只可惜他们不能充其量。孔广森从顾氏以‘裘’入之,却又以为‘寒者求衣,故其字从衣从求,似会意,非谐声’,想借此卫护‘凡同声符者必同部’之说,其实可以不必”(119—120页)。所以王先生这篇文章中图表例字的选择都以《诗经》为准,依谐声偏旁当属彼部者,则依《诗经》用韵归属此部。

王力先生在古韵分部上的贡献就是把江有诰的脂部析分为脂、微两部。这首先是受了章太炎的《文始》从脂部中析出队部来的启示,同时在他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中也发现南北朝脂微韵不同于《切韵》脂微韵之处(即《切韵》的脂韵舌齿音合口呼“追绥推衰谁蓑”等字在南北朝该归微韵),恰恰就是章氏归入队部的字。再以《诗经》用韵来对比,然后得到确切的证明。虽然在108个韵例中有26处脂微合用的情况,但两部的主要元音只是相近而不相同。后来他的高足董同龢先生著《上古音韵表稿》(1944年)^③,运用《说文》谐声字材料进行检验,进一步证明王先生的“脂微分部说是值得而且必须采纳的”。1956年王先生汇编他的《汉语史论文集》(1958年)将董先生《上古音韵表稿》中关于论脂微分部问题的一节附录在《上古韵母系

统研究》一文之后^④。而在1980年出版的《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所收此文之后他又删去了这一节附录。王先生没有说明理由。但我们在该文第一节“7、选字问题”中可以找到答案。他说:“除了江有诰之外,普通古音学家的选字,往往以《说文》所有的字为标准。这自然比根据《广韵》或《集韵》好些,因为某一字既为《说文》所载,它的时代至少是在东汉以前。不过,这种办法还不能没有毛病;《说文》里也有许多字是先秦书籍所未载的,甚至有些字只见于《说文》,连汉魏以后的书籍中也不曾发现过。这些字虽不能说先秦绝对没有,但是不该断定先秦一定有。为慎重起见,我们该取‘宁缺毋滥’主义,把先秦史料所未载的字一律削去。”(127页)王先生认为《诗经》最可靠,所以他这篇研究上古韵母系统的论文主要根据《诗经》用韵,增收的字也都见于《诗经》(依诸声分为三十二类)。而董先生的著作主要依据《说文》。它在补充论证“脂微分部”问题上,是有意义的。但与王先生对《说文》谐声字的看法有所不同。因此王先生后来不再将董说附录在自己的论文之后,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在编辑《王力文集》时尊重王先生晚年的意见,也没有把董先生的补充论述逐录进来。

三

王力先生关注音韵学、进行古音研究的第二阶段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此阶段,他首先根据教学需要,撰写了《汉语史稿》^⑤。其中上册《语音的发展》(1957年)基本上是总结以前的研究成果。其第二章第十一节“上古的语音系统”,先从韵部讲起。首先介绍清代学者研究先秦古韵的根据和方法,指出他们“主要是靠两种材料:第一是先秦韵文,特别是《诗经》里的韵脚;第二是汉字里的谐声偏旁(声符)”(九80页)。王先生说:“段玉裁等人又发现一件重要事实,就是谐声偏旁和《诗经》韵脚的一致性。段玉裁说:‘同声必同部’。

意思是说,凡同一谐声偏旁的字,一定同属于一个韵部,也一定和《诗经》的韵脚相符,因为先秦的韵部是从《诗经》的韵脚概括出来的。例如《诗七月》六章‘瓜’字和‘壶’‘苴’‘樗’‘夫’押韵,可见‘瓜’字应该念得像‘孤’;而从‘瓜’得声的字如‘孤’‘弧’‘狐’等也正是和‘壶’‘苴’等字的韵母是一类的,可见‘瓜’字本身的韵母也不能不同类。有了谐声偏旁这一个有力的佐证,先秦的韵部更研究得严密了”(80—81页)。接着王先生提出分古韵为十一类二十九部,并与《广韵》对照列表举例。他解释说:“同类的韵部由于主要元音相同,可以互相通转。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有之和职、幽和觉、宵和药、鱼和铎、支和锡。上面所说的凡同谐声偏旁必同部,那只是个原则。实际上凡同类的韵部,其谐声偏旁也可以相通,如‘萧’在幽部,‘肃’在觉部;‘遗’在微部,‘贵’在物部;‘难’在寒部,‘讎’在歌部;‘愚’在侯部,‘颙’在东。这因为造字时代要比《诗经》时代早得多,少数谐声偏旁和《诗经》的韵部不一致,是因为《诗经》时代的语音系统已经起了变化的缘故。”(84—85页)王先生在这里还批评了高本汉由于“拘泥于谐声偏旁的痕迹,于是把‘之’‘幽’‘宵’‘支’四部的全部和‘鱼’的一半都拟成入声韵(收-g),又把‘脂(微)’部和‘歌’部的一部分拟为收-r的韵,于是只剩下侯部和歌部的一部分是以元音收尾的韵,即所谓‘开音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开音节是像这样贫乏的。只要以常识判断就能知道高本汉的错误。这种推断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85页)。下面王先生还批评了高本汉在构拟上古声母时由于也是根据谐声偏旁来揣测,同样犯了形式主义错误(91页)。他还说:研究上古声母,“上古韵文不能再作为根据,剩下来的只有谐声偏旁。大致说来,凡同声者必同声类(例如侯音),但不一定同属一个声母(例如‘廣’,黄声,‘廣’属见母而‘黄’属匣母)。除了谐声偏旁之外,还有一些辅助的证据,例如异文(‘伏羲’、‘庖羲’),古读(‘古读猪如都’),声训(‘邦,封也’;‘法,逼也’)等”(87页)。他在这里提出上古声母分为六类三十二母的主张(87—90页)。

在《汉语史稿》上册“绪论”第四节“汉语史的根据”里王先生也说

到形声字的作用。他说:“汉字本身的结构也就反映着上古时代汉语的情况。所谓‘六书’除了‘转注’不容易懂之外,其他都有助于汉语史的研究。……形声字一边是形,一边是声,它们不但能让我们知道原始意义,而且能让我们知道原始语音的大概”(28—29页)。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语音的大概”。

在这一阶段后期,即60年代初期,王力先生写了两本音韵学著作,即《汉语音韵》(1963年)和《清代古音学》(讲义写于1962年,1983年又重写,1992年出版),又写了《中国语言学史》(1963—1964年在《中国语文》上连载,1981年出单行本)。后两种原是王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两门课。三本书都有专章讨论“古音学”^⑥。此外,还发表了三篇音韵学论文,即《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收音》(1960年)、《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1963年)和《先秦韵部拟测问题》(1964年)(均收入《王力文集》第十七卷),也都是着重研究了上古音,可以说是对他在《汉语史稿》中提出的上古音体系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和论证,从而也进一步系统阐明并运用了他的谐声学说。

我们先看王先生在三部著作中关于谐声学说的论述。在《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第十四节“古音学”中评述段玉裁时说:“第三、段氏建立了‘同声者必同部’的理论。本来宋徐藏在他的《韵补序》中已经讲到谐声与韵部的关系,他说:‘如羴为亡皆切,而当为陵之切者,由其以狸得声……’江永也讲到这种关系,如云‘熨蔚从尉,沸费从弗’(《四声切韵表》凡例)。但是明白地作为一个原则肯定下来,则始于段氏。后来朱骏声就依照这个原则来编他的《说文通训定声》,以声符为小韵部。当然这不能绝对化,因为造字时代距离《诗经》时代已经很远了。但是,作为区别同韵字的一个原则,基本上还是可用的”(十二185页)^⑦。王先生的观点很明确,用不着多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早在宋代,徐藏已经利用谐声字来研究古音了。同时再次强调,造字时代远于《诗经》时代,运用谐声原则不可绝对化。

王力先生的《清代古音学》更全面地介绍了清代古音学家的谐声